

“经世”与“致用”合为“经世致用”一词并广为使用是在晚明时期,然其思想内核或者说精神旨趣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篇,其中讲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成玄英对此疏解道:“夫祖述轩顼,宪章尧舜,记录时代,以为典谟,轨辙苍生,流传人世。”对于“经”字的本义,《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注曰:“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也就是说,“经”字的本义即是经线,而经线处于中枢的关键地位,后来又逐渐引申出大纲、纲领的含义,它的作用是导引秩序和法则。综合成玄英的疏解和段玉裁的文字训诂,我们大体可以推出,所谓“经世”主要是指建构和塑造政治、社会、道德伦理等各方面的章法和秩序的实践活动。经世致用思想是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一方面,它既关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道”的层面;同时,它也更加强调制度、方针政策等具体的治理之“术”层面的关怀。经世致用思想中所包含的重实用、重实践的理念、家国天下情怀和入世担当的精神在今天依然难能可贵,具有高度的现实指导意义。

经世思想之孕育绽放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家皆积极鼓吹各自的治国理政思想,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乃是中国经世思想启蒙并走向繁荣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如道家学派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葬;法家学派主张严刑峻法、重视农战等,正如庄子所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诸子百家莫不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来宣扬推广其经世理念及其实践路径。而诸子之中,最具有经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当首推孔子。纵观两千余年的华夏历史,自春秋战国以降,孔子及其门人后学的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走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后世很多的经世致用和治国理政思想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孔子那里找到源头。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为图争霸而互相征伐,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导致礼坏乐崩,天下无道。面对社会失序、民生凋敝的混乱局面,孔子没有选择消极避世和明哲保身,而是不惧艰险磨难,苦心游历四方,为了弘扬礼乐教化、重塑天下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奔忙一生。孔子曾说“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立志以弘扬天道和践行仁德为己任。而孔子所

说“士志于道”和“天下有道”的“道”,某种意义上讲即是经世的精神,“士志于道”也就是不懈追寻和努力建构合理的人间秩序。在追求天下有道的过程中,孔子不在乎外在客观条件的束缚,不计较个人成敗得失,以一种积极的入世姿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出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来自于六经和先王之教,并且在与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中发展壮大。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张乃是为扭转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换句话说,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非执着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孔子曾说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体现出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实践性格。此外,从孔子特重人间性和实践性的经世思想中还可以看出他对于民众朴素的同情和热爱,比如孔子曾多次说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西方来源于宗教天国的博爱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综合孔子一生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所具有的积极入世的精神、重视实践的性格、对于三代文明的整理传承和对于道的追寻,体现出丰富的经世思想和强烈的淑世情怀。可以说,孔子不但是经世理念的重要践行者,同时也塑造和拓展了经世思想的理论蕴含。

经世思想之再度兴盛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不断演进,至宋代,经世思想再度兴盛成为重要的时代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便是南宋事功学派的兴起并且同理学、心学展开争锋。我们知道,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九渊“心学”,无论是主张“格物致知”或是“发明本心”,尽管心性修养的路径不同,事实上二者的关注点都是聚焦在内圣的工夫上,其经世之道都是在设想一条由内圣而开外王的道路。如程颐曾说道:“修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陆九渊也说过:“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则与理学、心学的思想大异其趣。虽然同样都是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他们则更加强调道义与功利的融合,更加注重“外王”的事功实践,推崇“修实政”、“行实德”,反对空谈心性义理,反对儒者

流连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之境。正如黄宗羲评价的那样:“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对于宋代儒家的经世思想,我国台湾学者张灏曾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梳理。他认为“经世”理念首先是儒家的天职理想,其中包含着积极入世的精神,而这种入世精神不同于西方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其背后的动力乃是源自于对天道的信仰;其次他借用程颐“治道”和“治术”的概念,将经世思想概括为儒家对于政治秩序、价值取向的关切以及具体的施政方针、治国之术。张灏的梳理最具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经世思想中所蕴含的文明和文化的内涵,虽然他使用的是“政治”一词,但是在他的意识中“政治”其实是个大概念,包含有儒家非官僚体制的制度设计,如祠堂、学校等,他称之为“软性的非官僚体制”,这实际上是察觉到了“经世”所包含的文明向度和文化视野。正如成玄英所疏解的那样,“轨辙苍生”强调的乃是一种广阔的秩序,不仅关涉政治,还包含有文化、社会、经济的层面,当然政治秩序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关键维度。我们可以看到,张灏先生所梳理出的“经世”思想这三个层面的含义大体上都可以在孔子那里找到源头。作为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锋,理学、心学、事功学派事实上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重点来阐述通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也即经世思想的不同维度。如果说理学、心学强调的是“治道”的层面,那么事功学派则更加倾向于对“治体”的关注,展现出高度的社会实证性和经验实践性。而后者更是跟顾炎武等人力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更多的会合相通之处。

经世致用思想之勃兴

自宋代以降,谈及经世致用思想,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但是,其间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同样对于经世思想的发展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我们知道,孔子讲过“君子有不仁者,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宋儒推崇士人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强调士人君子群体的经世责任,认为经世之主体乃是士人君子。而王阳明却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所谓“心即理”,即是说本心即理,因为本心中先验地具有道德原则,从

本心出发便可使所言所行皆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而在王阳明看来,本心、良知、良能乃是人人都生而具有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节庵方公墓表·乙酉》一文中,王阳明又说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按照余英时的说法,王阳明的思想体现宋代以来士大夫群体经世路径由“得君行道”向“见民行道”的转变。然而不管怎么说,王阳明的这些思想主张在客观上大大冲破了阶层的局限,使得经世思想的主体范围大大扩充了。这个思想后来在顾炎武那里再度得到弘扬,“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担当天下兴亡的重任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成为建构合理人间秩序的主体。

再者,“经世”思想发展为“经世致用”思想同样与王学密切相关。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因为特重内圣的心性修养工夫,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世思想中的“治法”或“治术”的层面,其中尤以陆王心学的内化为甚。虽然王阳明本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均成就卓著,然而王学后学却多流于狂放不羁,几近狂禅,严重偏离了儒学经世的传統,对学界和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危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倾向和理论性格的导引。

晚明时期心学思想盛行,“无事手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导致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弊端丛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空疏玄虚之风给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百姓的民生福祉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且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亡。在他们看来,心学末流之空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士人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脱离文献基础,根据自身好恶随意解经,导致学界争嚷不休,学术思想陷入混乱;二是学术研究、学术关怀与社会实践脱离,学者们耽溺于义理的思辨之中,坐而论道,对治理世务漠不关心。

晚明三大儒正是有鉴于此,对心学末流痛加批判而大力弘扬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实学。为了清除心学空疏之流弊,顾炎武等人重新倡导对儒学经典文献的训诂考据工作,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同现实政治、社会实践的需要结合起来,提倡崇实黜虚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例如,顾炎武本人在著作文章时“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清史稿》中评价他说:“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

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力倡导重视国计民生等社会现实问题,重视现实具体的政治社会的治理实践,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实学之风。明清之际,西学之传入,亦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之勃兴。有学者把“西学”传入以康熙中叶(1691年)为限分为前后两期,自明中后期,西学即渐入中国,并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影响。当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十分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证实精神,发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之言,期望欲十年左右时间对“有益世用”之图书“渐次广译”,以开启民智,挽救明朝的社会政治危机。清朝建立后,“西学”继续传入,其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应了当时经世实学思潮的新形势需要,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西学”的传入,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丰富了日益高涨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内容,成为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勃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中期和晚期的经世派与此一脉相承,而这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对“经世致用”概念最习以为常的用法。

经世致用蕴意定格

通过前文可知,“经世”一词的含义十分广阔,“经世”一词几经流转变迁,在明末时期同“致用”结合在一起并被广泛使用,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应当说并非偶然的现象。它既是儒学内部理学、心学等思想理论自身发展演进所催生的结果,同时也跟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经世”与“致用”合用,更加强调的是对经世路径的侧重,是对其中所蕴含的实践、实用内涵的凸显,更加注重经世思想中实用性、技术性的实践层面。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们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注重实用理性,力图扭转浮躁玄虚的社会风气,让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民生的实际需要。加上西方自然科学之证实精神之传入,至此,“经世致用”一词的蕴含大体定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理念,我们要充分挖掘经世致用思想的丰富内涵,继承其合理内核,努力做到知行合一、道技合一,将个人的价值追求同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有益的智力支持。

【作者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2025年10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黄绮文
校对 姚毅

文史哲

哲学讲谈

文史纵横

谈潮剧经典剧目《梅亭雪》

□吴国钦

《梅亭雪》演王金龙与苏三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潮汕人并不陌生,尤其是老一辈潮汕人,更为熟悉。上世纪30年代,潮剧著名教戏先生、作曲巨擘林如烈编撰《王金龙》剧(又名《三司会审》),唱腔优美婉转,不胫而走,某些唱段,如重六调二板:“王金龙命中不幸,长街求乞,凄惨重重……”俗称“王金龙板”,竟从上世纪(下同)30年代一直唱至当下,可见其巨大的艺术魅力。

《王金龙》故事本源,见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京剧、川剧、徽剧等皆有《玉堂春》剧目,京剧还有梅兰芳、荀慧生的不同演出本。《三司会审》(京剧叫《三堂会审》)的情节,原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并没有写到。究竟是京剧原创,还是潮剧剧本创作在先?已很难考定。迄今,山西洪洞还有监禁苏三的监狱存焉,笔者曾前往参观。小说的人物事况演变成旅游景点,岂非佳话一桩!可见王金龙、苏三故事作品影响之深远。

潮剧《王金龙》(《三司会审》)写世家子弟王金龙与北楼名妓苏三(玉堂春)相恋,其父闻觉,将他打至半死,逃脱后沦为乞丐,得苏三资助赴考,得中授山西巡按。苏三却把鸨母卖给沈员外为妾。沈妻皮氏欲毒杀苏三,误将丈夫毒死,遂厚诬苏三毒死亲夫,致苏三下狱。这桩人命案,由巡按王金龙、臬司刘秉义、藩司潘必正三司会审。刘、潘二司在审案过程中,看出此案的蛛丝端倪,发觉案中苏三的相好者,正是危坐中堂的王金龙。戏的看点全在王金龙的尴尬上头。王欲相认,恐有辱官体,失去乌纱;不相认又于心不安,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使戏剧矛盾悬而不决,加上刘、潘二司的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整个戏十分引人入胜,观众的审美期待得到极大满足。最后,刘、潘二司顺水推舟,成全好事,为苏三反冤案,王金龙与苏三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金龙》剧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跌宕起伏,令人扼腕。正是由于不寻常的遭遇搅动观众心扉,戏码充足,剧作成

为潮剧一个著名的传统剧目,30年代唱遍潮汕城乡,60年代还由香港光艺制作公司拍成电影公演。

“三司会审”之后,剧情已近尾声。原著小说写王金龙做了巡按之后,命刘推官审苏三案,刘推官很快就平反冤案,将悍妇皮氏等绳之以法,王金龙、苏三团圆。《梅亭雪》可以说是在戏的末尾缝隙中,深入挖掘人物内心活动,捕捉戏剧性,使它成为与《扫窗会》《芦林会》《井边会》《柴房会》《南山会》等一样著名的潮剧经典折子戏,俗谓“五会一亭”。

《梅亭雪》是谢吟、王菲、郑文风编剧,这几位都是潮剧编剧老行尊,个个都是研轮老手,可以说在文本创作上已拔头筹。剧情是:刘秉义命狱吏押苏三夜至梅亭,他估计王金龙日间在三司会审公堂上不好相认,夜间必来会晤苏三。果不其然,王金龙去掉官位的羁绊,乔装前往梅亭认妻。

本折戏剧情是:梅亭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苏三与狱婆被冻得瑟瑟发抖。王金龙上场后,“见故人我悲喜交并,满怀心事欲诉无凭”的曲调,把王此时面见故人内心的紧张、喜悦、兴奋与忐忑不安和盘托出。看到苏三衣衫单薄,王金龙赶忙将自己身上的披风披到苏三身上。但苏三想起自己过去的苦难,“到今日披枷锁有冤难鸣”,悲从中来,怨从中来,一句“何苦甜言蜜语假惺惺”,犹如一记重锤敲在王金龙心上。苏三甩掉王金龙的披风,使王金龙不得不说出自己公堂之上未有相认的原因:

“都只为三司会审,王法无情,堂上阶下虽咫尺,犹如银河隔双星。案如山重官身薄,偶一不慎丢前程。进退两难一时不敢认,致令我纵不负卿亦负卿。”

这一唱段,通俗上口,入耳消融,将王金龙心中矛盾道出,尤其是“案如山重官身薄”一句,一重一薄,对比强烈,形象

生动。但苏三依然气难平,怨难消,不依不饶,一句“头上乌纱重于情”,乃点睛之笔,把问题实质挑明。苏三觉得你没有变心,为何公堂之上不敢相认?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看重乌纱帽?的确,是否相认?是《梅亭雪》戏剧冲突的触发点,也是戏剧冲突之核心。王金龙不得不不再三剖白心迹“公堂法地虽然不敢将妻认,今夜我愿违法寻妻到梅亭。望你细将蒙冤事,一一对我说分明;才可据理平冤案,才可重续鸳鸯盟”。王、苏二人此时地位悬殊,听到苏三诉冤之苦况,王心如刀绞,十分痛惜,惟有处处陪尽小心:“若非你,金龙早已长街成饿殍;若非你,我怎能胸悬金印立朝班?”这些肺腑之言,表白了王金龙大而不忘故情,位高而决心解救三姐于水火,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

《梅亭雪》成为经典,作曲黄钦赐功不可没!黄钦赐童伶出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灌录唱片300张,是当时红遍潮汕与东南亚的旦角童伶。解放后在广东潮剧院任作曲,他谱写之曲曲调优美,曲路大气,曲情饱满而曲意通俗,朗朗上口,潮剧界誉为“钦赐曲”。如王金龙上场一句“见故人我悲喜交并”,拖腔之后突然提升八度,把王与苏三会晤时的情感抒发用流畅而高亢的旋律,塑造出人物丰富生动的音乐形象。此后,王、苏的几个主要唱段,至今坊间仍十分流行,成为观众百听不厌的名曲,这是《梅亭雪》之“戏宝”,是《梅亭雪》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

《梅亭雪》的主演是姚璇秋与陈瑜。姚是潮剧剧种的代表性人物,唱腔珠圆玉润,不躁不火,委婉隽雅;她是潮剧最出色的乌衫(青衣),唱做俱佳不必说。她演的苏三,满腹冤情,满腔悲愤,演来哀怨欲绝,“想当初蒙垢偷生,只望你展翼鹏程。到今日,你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晓得官家体面,纱帽前程,却不怕负恩忘义千载骂名!”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苏三的悲剧形象,婉转悲憾,感人至深。

成就《梅亭雪》的艺术家们多数已作古,只有陈瑜是潮剧著名



《梅亭雪》剧照,
姚璇秋饰苏三、陈丽华饰王金龙。图片来自汕头市潮剧研究会网站,援引《汕头日报》文章

的女小生,与姚璇秋属姑嫂关系,演来亲密无间,配合默契。陈瑜表演情感真挚,做功潇洒大方,嗓音清润明澈,与姚璇秋合作,堪称珠联璧合。坊间好事者曾将林燕云、钟怡坤、陈瑜三位最有名的女小生在《梅亭雪》中的“见故人我悲喜交并”唱段来个“比赛”,然后由观众投票分高下:林燕云是梅花奖得主,唱腔浑厚大方,委婉中带有一股英气;钟怡坤是老牌女小生,演唱中规中矩。投票结果,三人各有各的“粉丝”,陈瑜略胜一筹,可见她在观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梅亭雪》导演吴峰,是广东潮剧院资深导演,他把《梅亭雪》的编剧、作曲、表演以及舞台设计(管善裕)、服装设计(陈木森)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梅亭雪》是生旦对手戏,戏剧矛盾集中在“是否相认、如何相认”上。王金龙用真情化解苏三的怨恨,他在一句“贤妻”,右一句“我的妻”,对苏三体贴入微,温暖了苏三原本绝望的心。王金龙并非做了大官就黑了心的陈世美,“非我负盟忘故约,非我得志恋新欢。”他梅亭会妻的举动,表明他的果敢与担当。无论是苏三的悲苦与王金龙的深情,戏的看点与泪点交织,令人唏嘘,催人泪下。《梅亭雪》因此成为一出观众喜爱、经常上演的

折子戏。艺术无非是用高尚的情操与悲悯的情怀去软化观众的心灵,教化观众,《梅亭雪》正是这样的艺术品。60年代的电影演王金龙做了巡按之后,娶官家之女刘治如为妻,是刘治如前往监狱探望苏三,再将苏三冤情转告王金龙,王金龙才据实平反苏三冤案,并迎苏三入府中。这样写,我以为严重损害王金龙的形象。《梅亭雪》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剔除了原小说中过分渲染皮氏奸淫、投毒的情节,删除了原小说并未出现的刘治如这一人物,删枝去蔓,接续了《三司会审》的精彩关目,另辟蹊径,深挖男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使王金龙成为一个令人赞叹的情深义重的艺术形象。苏三则是一位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妇女,虽然拥有“名妓”的光鲜头衔,也摆脱不了被玩弄、被卖、差点被毒杀的可悲命运。正是由于男女主人公不可抗拒的命运,使观众时而赞叹,时而一掬同情之泪。因为多位老艺术家的超常发挥,使《梅亭雪》成为不可多得的经典,尤其是姚璇秋与陈瑜的精彩演绎,令后来者很难企及!致敬经典!致敬老一辈的潮剧艺术家!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